



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前的陆家嘴老照片。



当今上海城市名片中最靓丽的陆家嘴夜色。摄影/杨帆

德·汉普顿（Fred Hampson）声明“没有来自共产党的压力”。根据他的说法，正面报道是因为新旧政权之间的鲜明对比。《字林西报》也刊登了一篇名为“好新闻”的社论，捍卫其报道遵循新闻诚信。该报指出“（各大公司）上海办事处向外发出的私人商业电报也证实了新闻报道中的正面评价”。

如今，时常有外媒变换角度报道上海。比如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赞叹“上海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向上和向外发展”；法新社报道中国国产邮轮“爱达·魔都号”在上海启航；彭博社报道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苹果上海静安店现场与粉丝互动……尽管在西方总有人一如1949年时那些英美媒体编辑一般，总想说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妙，甚至不惜戴着有色眼镜夹着嗓子说怪话，但中国的发展、开放、自信，其中包括上海之深度链接国际，更有目共睹。

社会主义的上海

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学术委员吴新文看来，近代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太平洋西岸的纽约”，表面上看，这是赞叹上海的繁华、摩登、浪漫，但这也意味着近代上海的形象主要是被西方人建构的，更表明西方人在主宰上海。上海的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废除了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洋人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教会的权力，没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巧取豪夺的大量资产，并通过文教系统的改造、调整、整合和重建以及大规模群众教育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清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影响。

吴新文说，这是上海的“再中国化”，唯有如此，上海才

能打破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各国势力在华的“跑马场”、外国在华利益的“输出地”的种种名头，开始真正成为“中国的上海。”“中国的上海”，亦即社会主义的上海，一步步发展起来——

1955年2月至4月，丹麦画家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写生旅行，先后访问了北京、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用自己熟悉的创作手法描绘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状况。他对上海新建的一处工人新村的描述是，“新建的工人街区有足够三万居民住的房间。这里有宽阔的街道，有绿树，阳光充足，空气清新，还有正在建设的学校、幼儿园和保育所，孩子们正在安静的街道上玩耍”。外国友人描绘的这一景象，是解放后很多新建工人新村的缩影。

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与崇明10县划给上海，上海市域面积从600多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大到约0.6万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跨区域统筹协调，极大增强了上海发展的潜力。”吴新文对此评论称。他还认为，当时出现了“全国支援上海，换来了上海支援全国、上海与全国各地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比如上海全市直接为鞍钢建设工程协作生产的就有30个工厂，78种产品；长春第一汽车厂需要的43种产品，西北油田需要的400多种机械配件，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官厅水库等十余处水利工程的40套闸门和100余台启闭机，都是上海生产的。上海还为各地发展纺织、造纸、印刷、橡胶、制药等工业以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供了大量设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不仅为全国各地提供产品、设备和技术资源，还提供人才支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上海在科技创新和